

加入WTO後的中國農業和農民

胡鞍鋼

中國加入WTO之後，在享有經濟全球化收益的同時，急劇地增長了開放市場的種種風險，這包括現在的社會衝突顯現出來，外部衝擊直接影響宏觀經濟穩定，尚不具備利用經濟全球化的人群，地區邊緣化，尚不具備國際競爭力的企業，行業和部門受到嚴重衝擊，原有的經濟不安全、社會不平等及政治不穩定會隨之被放大或者相互關聯強化，如果不能夠有效地管理社會衝突，就可能由經濟危機引發社會危機，由社會危機引爆政治危機。就中國加入WTO之後的具體受益和受損情況而言，那些在近期改革中遭受沉重成本負擔的階層所受到的打擊將是最大的^①。其中，我國八億農民^②，至少在短期和中期內，是受到衝擊最大、風險最明顯的人群。因此，中國加入WTO之後的首要任務，就是提高國家管理社會衝突和協調社會利益的能力，使全社會各利益主體特別是使八億農民及弱勢人群從市場開放中降低各種成本和代價，應使他們收益最大化，風險最小化。

中國加入WTO之後，我國八億農民是受到衝擊最大、風險最明顯的人群。外部衝擊直接影響宏觀經濟穩定，原有的經濟不安全、社會不平等及政治不穩定會隨之被放大或者相互關聯強化，如果不能夠有效地管理社會衝突，就可能由經濟危機引發社會甚至政治危機。

一 發展中國家開放的悖論

改革不是發展的目標，只是發展的手段。開放政策不是替代發展戰略，而是發展戰略的一部分。美國哈佛大學國際經濟學教授羅得瑞克 (Dani Rodrik) 在總結亞洲金融危機的教訓中，批評了盲目崇拜開放論或全球化論。他認為，沒有證據為許多人所宣稱的全球經濟一體化本身將改善經濟績效的觀點提供支持。他發現社會衝突及其管理在外部衝擊對經濟的影響方面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如果潛在的社會衝突愈大，外部衝擊對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就越大，例如收入差距越大的國家，經濟增長下降的幅度也越大；社會分裂程度越多的國家，對外部衝擊的應對能力就越差；同樣在給定的外部衝擊和社會衝突情況

下，解決和處理衝突的管理機構越脆弱，例如缺乏人民廣泛參與的政治民主，缺乏社會保障制度和資金補償利益受損者，缺乏良好的政府治理、司法和公民權利制度保護，那麼遭受經濟動盪和衝擊的可能性就會增多。這是許多拉美、中東或其他發展中國家發展戰略中的痼疾，就像「腳後跟」一樣，滯後的反映和脆弱的管理能力是這些國家在經濟全球化中內部動盪不止的原因所在。最近的一個典型案例就是經歷了長達30多年經濟高速增長的，但是經濟愈來愈不平等，政治愈來愈腐敗的印尼蘇哈托(Suharto)政權在受到亞洲金融危機衝擊之後的垮台，這個多民族國家在危機中走向混亂，GDP總量下降了20%以上。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全球化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性選擇，但又是一個嚴酷的社會衝突現象。發展中國家要加快發展就必須開放，但開放不是「免費的午餐」，不是沒有經濟社會成本的，而且風險極大且相當不確定。愈是發展速度快，開放程度大的國家，內部發展不平衡性就愈明顯，社會衝突可能性就愈大。這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悖論，也是開放的悖論。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經濟全球化既是重要的歷史性選擇，又是嚴酷的社會衝突現象。發展中國家要加快發展就必須開放，但開放風險極大。愈是發展速度快，開放程度大的國家，內部發展不平衡性就愈明顯，社會衝突的可能性就愈大。這是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悖論，也是開放的悖論。

二 中國加入WTO最大風險是農業問題與農民收入問題

中國加入WTO最大風險是甚麼？就是長期存在的日益突出的農業問題與農民收入問題，加入WTO之後則使中國發展最大的問題「雪上加霜」。當談到中國農業和農民時，江澤民總書記多次講到，「我常常睡不着覺」。也正如朱鎔基總理最近坦然所言，加入WTO之後「我最大的擔心是農業問題」。為甚麼中國加入WTO之後最大的風險是農業，最大的衝擊人群是八億農民？

首先，農村、農業與農民問題始終是中國現代化長期發展的核心問題之一。這是與中國的基本國情相聯繫的。2000年中國農村人口八億人，佔全國總人口的2/3，1999年世界農村人口32億人，佔世界總人口的46%^③，中國農村人口佔世界農村人口的1/4。2000年中國農業勞動力佔總勞動力的一半，這相當於美國、法國、德國在1870年的比重^④。這些基本國情在短期內很難改變。過去十年農業附加值GDP總量比重大幅度下降，由1990年的27%下降至2000年的16%^⑤；按支出法計算，農村居民消費額佔GDP比重由1990年的28%下降至2000年的22%^⑥。這兩個比重明顯下降，使八億農民處於極其不利的境地。

其次，我們來看看中國對開放農產品的承諾與對國內市場的短期衝擊。

我國對開放農產品市場的主要承諾：在過渡期內逐步增加糧食、棉花、糖類等重要農產品的市場准入量；對重要農產品進口實行關稅配額管理；降低農產品進口關稅稅率；取消農產品出口補貼；約束國內支持。

2002年重要農產品的准入承諾：糧食關稅配額為1,830.8萬噸，其中：

玉米進口配額量為117億斤(585萬噸)，相當於國內產量的5.5%，商品量的

10%左右。2003年玉米進口配額量全部進口，國產玉米停止出口，國內市場供給量將增加250億斤左右，這將對國內玉米價格構成極大的壓力。

小麥進口配額169億斤(845萬噸)，相當於國內產量的8.5%，商品量的22%左右。小麥進口將衝擊國產優質小麥生產。

大米進口配額79.8億斤(399萬噸)，折稻穀110億斤左右，相當於國內產量的3%，商品量的11%左右。

食用植物油。我國油料和食用植物油生產長期不能滿足國內需求，一般年缺口200-300萬噸左右。去年進口較多，現在國內市場供大於求。2002年食用植物油進口配額573萬噸，相當於國內產量的60%，商品量的120%。目前國內食用油價格低於國際市場價格較多，食用油大量進口，將嚴重衝擊我國大豆生產和油脂加工業。

棉花。近幾年我國棉花一直供大於求。2002年棉花市場准入量1,637萬擔(81.85萬噸)，相當於國內產量的16%，商品量的19%。將對國內市場形成較大壓力。

食糖進口配額量176萬噸(含必須進口的古巴糖40-50萬噸)，相當於國內產量的23%，商品量的22%左右。國內的糖料生產和製糖工業也將面臨巨大衝擊。

天然橡膠。因加工貿易進口增加，2001年進口量有可能超過85萬噸，對國產橡膠造成嚴重衝擊。2002年天然橡膠進口配額為56.7萬噸，配額外不允許進口。進口橡膠對國內的衝擊將有所緩解。

羊毛。我國洗淨羊毛產量每年10多萬噸，年需求量(包括加工貿易)40萬噸，需進口彌補。2002年羊毛及毛條配額量33.6萬噸，對國內市場略有衝擊。

我們來看看對國內糧食生產衝擊和影響。

過去四年我國糧食總產量持續下降，已明顯低於現時生產能力。1998年我國糧食總產量達到最高峰，為51,230萬噸，2001年下降為45,262萬噸，已低於1993年的水平，比1998年減少了5,968萬噸，平均每年減少1,492萬噸，累計下降11.6%；其中稻穀生產量由1997年的20,074萬噸下降為2000年的18,791萬噸，減少了6.4%；小麥生產量由1997年的12,329萬噸下降為2000年的9,964萬噸，減少了19.2%；玉米生產量由1998年的13,295萬噸下降為2000年的10,600萬噸，減少了20.3%⑦。

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南方糧食進口省區直接增加糧食(主要是玉米)進口量，減少從北方糧食主產區的購買量；糧食進口量進一步增加，糧食生產量繼續下降。我們估計，未來5-10年我國糧食總產量還會減少5-10%，大約在40,000-42,000萬噸，相當於80年代中後期的水平。穀物產品由淨出口變為淨進口，穀物自給率降至90-92%。如果農業特別是糧食調整速度過快，調整範圍過大，不排除中國糧食生產出現「大滑坡」情形，甚至出現嚴重的萎縮現象。由於中國糧食或穀物生產量佔世界總量的1/5，不僅對國內糧食或穀物供給產生極大影響，而且還會對世界糧食或穀物生產與市場產生嚴重影響。

過去四年我國糧食總產量持續下降，估計未來5-10年我國糧食總產量還會減少5-10%，如果農業特別是糧食調整速度過快，調整範圍過大，不排除中國糧食生產出現「大滑坡」甚至嚴重萎縮的情況。這不僅對國內糧食供給產生極大影響，還會嚴重影響世界糧食或穀物生產與市場。

我們來看看對我國農產品出口的影響。一般認為，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後，我國勞動密集型農產品如蔬菜、水產品、豬肉、茶葉等出口額明顯增加。實際情況比人們想像的困難得多，我國增加農產品出口難度在加大。在80年代晚期，我國主要農產品產量就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農產品生產國，中國是世界上農產品生產量第一大國，例如1999年中國穀種產量佔世界總量的22%，油菜籽佔23.8%，花生佔38.2%，肉類佔26.3%，煙草佔34.9%，水產品佔29.5%^⑧。但是中國農產品出口比例極低。2000年我國農產品(食品及主要供食用的活動物)出口額為123億美元，佔全國出口總額的4.9%，佔農業總產值的4.08%，佔農產品成交總額的8.1%，佔世界農產品出口總額(5,580億美元^⑨)的2.2%。其中，穀物及麵粉出口量為1,378萬噸，佔穀物總產量(40,522萬噸)的3.4%；水產品出口量為120萬噸，佔水產品總產量(4,278.4萬噸)的2.8%；棉花29.2萬噸，佔棉花總產量的6.6%；花生計花生仁出口量為40萬噸，佔花生總產量(1,443.7萬噸)的2.8%；大豆出口量21萬噸，佔豆類產量(2,010萬噸)的1.0%；肉用豬203萬噸，佔肉豬出欄總數(52,673.3萬噸)的0.38%；只有茶葉出口量大，出口比例高，出口量為22.77萬噸，佔茶葉總產量(68.3萬噸)的33.3%^⑩。

儘管過去四年全國農產品銷售價格指數已累積下降了22.6%，但中國農產品的價格還是高於國際農產品市場價格20-40%。即使中國不降低農產品進口關稅稅率，在國際和國內農產品供大於求且價格持續下降的情況下，農民增加農業收入的可能性愈來愈少。

中國每個農業勞動力農產品出口額為34.5美元，是世界最低水平的國家之一。中國農業勞動力是美國農業勞動力的100倍，而過去五年美國農產品出口額(約520-600億美元)是中國農產品出口額(約100-120億美元)的4-5倍，中美兩國不僅農業勞動生產率相差極大，而且在國際農產品市場人均農產品出口額差距極為懸殊，大約在400-500倍之間。實際上美國農產品出口能力遠高於現實出口額，而中國對農產品有大量補貼(但是並沒有直接補貼廣大農民)，加入WTO之後，取消大部分補貼，其實際農產品出口能力將小於現實出口額，中國在主要農產品出口國際市場方面很難與美國競爭。

農產品價格指數持續下降走勢直接影響農民人均農業收入，過去四年已經損失3,000-4,000億元。1978-96年期間農產品價格指數上升5.5倍^⑪，大大超過國際市場價格水平，這是農民人均純收入不斷提高的重要正面因素，也反映了國內農產品市場需求大於供給的格局。但是當農產品價格指數達到最高峰之後，農產品價格不可避免的下降就成為影響農民農業收入的主要負面因素。在過去四年(指1996-2000年期間)，全國農產品銷售價格指數累積下降了22.6%^⑫，廣大農民直接現金損失在3,000億元以上；從農村居民家計調查看，1997年人均農民出售農產品收入為1,092元，到2000年下降為600元，約下降了45%，這相當於每個農民比1997年少獲農產品現金收入492元，這相當於八億農村人口減少現金收入3,972億元(見表1)。據農業部估計，2000年全國農民因糧食一項減少收入約1,100億元左右，人均減少收入約125元，其中減產因素約佔1/3，糧價下跌因素佔2/3左右。佔全國農戶82%的純農戶和以農為主的兼業農戶純收入下降1%^⑬。

即使如此，中國農產品的價格還是高於國際農產品市場價格20-40%之間。目

表1 每個農民農產品出售收入和農業生產支出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上半年
出售糧食(公斤)	228.0	227.5	243.3	260.9	103.8
出售農產品現金收入(元)	1092.3	1011.1	970.2	600.6	224.4
農業生產現金支出*(元)	437.1	451.6	417.6	286.5	147.9
農產品盈餘(元)	655.2	559.5	552.6	314.1	76.5
現金收入(元)	2516.4	2528.3	2556.4	2381.6	
工資性收入(元)	512.4	573.4	628.4	700.4	
稅費支出(元)	108.0	106.7	89.9	89.9	
現金支出(元)	2297.3	2316.4	2338.1	2140.4	
稅費支出佔總支出比重(%)	4.70	4.60	3.84	4.20	

資料來源：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月報》，2001年第12期，頁71、72、74。

* 農業生產支出包括種植業、購置農業生產性固定資產支出。

前中國農產品生產能力已居世界首位，國內供給相對過剩。即使中國不降低農產品進口關稅稅率，在國際和國內農產品供大於求且價格持續下降的情況下，從總體上看，中國農產品不具競爭力，農民增加農業收入的可能性愈來愈少。

對貧困地區和貧窮農民收入影響衝擊最大。例如2000年全國農民人均純收入一半來自農業收入^④。西部地區農民人均收入60%以上來自於農業收入，貧困農民這一比例高達70-80%。他們不像東部地區或富裕農民，非農產業收入特別是勞務收入已超過總收入的一半以上。貧困地區和貧困農民通常是中國生態脆弱地帶，農業生產條件惡劣，自然災害頻繁，家庭小規模經營，農業勞動生產率低下，交通條件不便，市場交易成本高，農產品交易比例低，再加上各種攤派稅費比例高，非農就業和收入機會少。1996年全國農村人口人均年純收入低於1,000元比例為18.0%，約15,560萬人，到2000年這一比例為14.18%，約11,450萬人^⑤。同期他們人均收入相對全國人均GDP水平由17.9%下降到14.1%。從國際經驗來看，除少數像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農業資源豐富，農業勞動生產率水平高的國家之外，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農民都是農業貿易自由化的利益受損者。中國貧困農民一方面是經濟全球化的邊緣化地區和邊緣化人群，另一方面受到農業貿易自由化的嚴重負面影響，成為利益受損主體，除非國家和全社會予以必要的補償。

農民農業剩餘所剩無幾。過去四年不僅農民農業收入大幅度下降，而且農業剩餘大幅度減少。為了方便計算，這裏農業剩餘或農業盈餘是指每個農民出售農產品現金收入減去農業生產現金支出，不包括農業勞動工資。1997年每個農民的農業盈餘為655.2元，到2000年降至314.1元，累計下降了52%（見表1）。如果計入農業勞動工資，實際每個農民的農業盈餘可能為零甚至為負值。我們可

過去四年不僅農民農業收入大幅度下降，而且農業剩餘大幅度減少。如果計入農業勞動工資，實際每個農民的農業盈餘可能為零甚至為負值。加入WTO之後，可以預期的，農民還會進一步減少對農業的各類投入，出現農業生產萎縮的情形不是不可能的。

以看到(見表1)，由於農業幾乎沒有甚麼收益，農民對農業生產的現金投入明顯減少，由1997年的人均支出437元到2000年降至為286.5元，累計下降了40%，這相當於全國農民對農業生產投入減少1,200億元。加入WTO之後，可以預期的是，農民還會進一步減少對農業的各類投入，不僅減少資金投入，而且減少勞動投入，出現農業生產萎縮的情形不是不可能的。

中國農業勞動力的剩餘勞動時間比例或者剩餘勞動力大幅度增加。根據我們採用「機會成本」分析方法對農業剩餘勞動力的經濟損失研究，當農業剩餘勞動時間達40%以上，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到1/4-1/3的GDP。當中國向美國農產品開放市場，不是像人們所估計的只是佔農業勞動力總數3.5%的1,200多萬農民失業，而是在現有佔1/4世界農業勞動力總數的中國農民剩餘生產勞動時間比例由40-50%提高到50-60%，甚至更高的比例，他們不大會走上街頭成為公開失業人群，而是大幅增加站在鄉村街道「曬太陽」的時間。那麼，農業剩餘勞動力所造成的經濟損失會更大。這是世界上最大的勞動力資源浪費和經濟財富損失。

中國目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務水平差距是世界上「壕溝」最大的國家之一，國家沒有對農民的經濟補償機制，八億農民也缺乏表達利益的政治民主參與機制。加入WTO後，農民不可避免地受到開放農產品市場的強烈衝擊，中國政府應在農民利益受到損害時給以補償，避免他們成為最大的輸家。

三 中國最大的潛在社會矛盾將日益突出

甚麼是真正的中國？我把她概括為「一個中國兩種制度」。這「兩種制度」不是指「一國兩制」，如大陸和香港，而是指過去50年中國大陸長期形成的城鄉居民的兩種身份制度、教育制度、就業制度、公共服務制度和財政轉移制度，以及兩種差異甚大的生活方式。這「兩種制度」的設計安排和延續，不僅導致了城鄉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日益擴大，也是導致城鄉居民公共服務水平差距懸殊的根本性制度原因。

從國際比較看，中國目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和公共服務水平差距是世界上「壕溝」最大的國家之一，同時既缺乏國家和社會對農民的經濟補償機制，也缺乏八億農民影響國家決策和利益表達的政治民主參與機制。中國農村人口佔總人口的2/3，但是政府財政用於農村發展的各類支出僅佔總支出的10-15%，佔GDP總量比重的1%左右。農民人均稅費高於城鎮居民人均稅費，而後者人均轉移支付又大大高於前者人均轉移支付。1998年中國政府為了應對亞洲金融危機以及國內通貨緊縮和經濟增長下滑採取了擴大內需的戰略性舉措，使城鎮約8,400萬人口直接受益，但是擴大內需的政策，如過去三年發行國債1.12萬億元，無論是擴大基礎設施投資還是刺激居民消費，都是偏向僅佔國土面積4%的城市及其佔1/3總人口的城市人口。按不變價格計算，2000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7年提高了23%，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僅提高了10.5%^⑥，城鄉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差距為建國50年來的最高峰。此外城鄉居民的公共服務水平，如基礎教育、計劃生育服務、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公用電信服務、清潔水供應(約有一半農民沒有用上自來水)等方面差距大，公共支

出和公共投資分配十分不公平。如前文所述，開放市場是促進發展的手段，它本身不是目的。加入WTO會使中國和世界長期受益，但是不會自動地使八億農民受益，或者不會自動地補償農民受損者的利益。對外開放的目的應使人民特別是八億農民受益。即使農民不可避免地受到開放農產品市場的強烈衝擊，也應使他們的風險最小化，使他們已經和正在損失的利益得到相應的補償。

一個國家政府制訂經濟政策和貿易政策的目的是甚麼呢？應當對誰負責？顯然，是對本國經濟發展負責，對本國人民負責。是人民選擇了政府，而不是世界市場選擇政府。加入WTO之後，中國政府將承諾遵守WTO規制和相關協議。但是中國政府更應對中國人民特別是八億農民作出承諾，當農民利益受到農業貿易自由化的損害時，能夠給以利益補償，使他們避免成為最大的輸家。

我曾於2000年9月明確向政府建議「擴大內需應使8.7億農民^①優先受益」。現在我進一步明確向政府建議「對外開放應使八億農民^②優先受益，普遍受益，實實在在地受益」，「使八億農民市場風險最小化」。

四 如何使廣大農民利益最大化，市場風險最小化？

首先，建立廣大農民的政治參與和經濟參與制度渠道，從制度上保證國家決策代表和反映八億農民的利益。這包括在制度上使他們充分享有公共事務信

一個國家政府制訂經濟和貿易政策時，應當對誰負責？顯然，是對本國經濟發展負責，對本國人民負責。是人民選擇了政府，而不是世界市場選擇政府。我建議擴大內需應使8.7億農民優先受益，對外開放應使八億農民實實在在地受益，使八億農民市場風險最小化。



息知情權、經濟利益表達權、政治民主參與權、財政分配決策投票權，以及享有國家憲法明文規定的社會保障和基本公共服務的公民權。應當恢復中共中央農村工作委員會，在黨內最高層形成代表廣大農民的政治決策代表人。應明文規定各級人大農業與農民委員會農民代表或委員不少於2/3，同時規定相應的權利和預算投票權。國家應制訂《農會法》，在農村依法建立農會，反映農民利益，保護農民利益，建立與政府的信息渠道，同時從事農村社區公益活動。對民主政治決策機制與決定政府財政支出程序的經濟決策機制改革，**從根本上改變長期城市統治農村，政府忽視農業，市民歧視農民的不平等、不公平、不公正的基本格局。**

其次，投資於廣大農民人力資本，提高他們的人類發展能力。各級政府用於教育、衛生、計劃生育、社會福利等公共服務支出同於農村的比例不低於當地農村人口比例的10-15%。這不僅符合社會公平，而且實現經濟效益。因為投資於農民人力資本的社會利益遠高於對非農民投資的社會收益，而對非農民人力資本投資的私人收益高於對農民投資的私人利益。國家應創造條件並鼓勵非農民特別是城市高收入居民自我人力資本投資，而將其公共服務投資重點轉向佔2/3總人口的農民。

第三，投資於農業及其相關領域的知識與技術，提高農產品質量和國際出口能力。由於國內外農產品市場的變化，中國農業發展的模式必須有重大轉變，從「數量型」增長轉向「質量型」增長，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和出口比例。提高農產品附加值和出口比例的根本性戰略性措施是提高我國農業科技創新能力，獲取全球農業科學知識和技術能力，廣大農民使用技術的能力。國際經驗和中國實踐表明，對農業研究與開發(R&D)的長期投資回報率相當高。由於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農產品生產國，任何農業科技創新和技術擴散都有明顯的大國規模效應。例如，袁隆平院士創造的「雜交水稻」和「超級雜交水稻」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目前國家用於農業支出包括三大項：支援農村生產支出，農業綜合開發支出和農林水利氣象等部門事業費。建設後增加第四大項：農業研究與開發和農業技術開發、利用和普及專項支出，不低於政府用於農業支出(2000年達745.8億元)的10-15%。即使如此，中國那麼大的國家，農業研究與開發支出佔GDP比重不足0.1%。

第四，投資於農村基礎設施，實現「七通」，明顯改善農民生活居住和生產貿易條件。今後對那些具有競爭性、盈利性，主要依託的基礎設施，應打破壟斷，放鬆管制，引入競爭機制和公開招投標制，政府基礎設施投資重點應轉向農村，一方面改善農村條件，一方面創造大量的就業機會，直接增加農民勞務收入。在全國農村人口聚集較多的鄉鎮和較大的行政村實現「七通」，既通公用電話和長話自動網，通衛星電視和有線電視，通廣播網，通郵政網，通電力(網)，通自來水或清潔水，通路(公路或鄉村道路)。

第五，為農民進城務工、人口遷移大開綠燈，使農民變為非農民，平等善

我們的研究表明，每1%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非農業，將使GDP增加0.50-0.85%；每1%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將使全國居民消費額提高0.19-0.34%。因此政府應取消城鄉兩種對立與區別的戶籍身份制度，取消各種違反公民權利的歧視性政策和人為規定，讓農民享有經濟和政治的自由權利。

待他們。我們的研究表明，每1%的農業勞動力轉移到非農業，將使GDP增加0.50-0.85%；每1%的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將使全國居民消費額提高0.19-0.34%。提高農民人均收入水平，改善農民生活條件，提供農民公共服務的根本途徑，就是堅決取消城鄉兩種對立與區別的戶籍身份制度，取消各種違反憲法賦予公民權利的歧視性政策和人為規定，使農民變為非農民，自由選擇職業和工作，自由選擇居住與遷徙，不僅享有經濟自由活動，而且享有政治自由權利，包括在工作 and 居住所在地的公民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當地公共事務的知情權和表達權，家庭和子女享有同等基本公共服務，如基礎教育、職業培訓、公共衛生、基本醫療服務、計劃生育服務等。

總之，中國加入WTO之後，最大的經濟風險是來自農業與農村，會使中國農業的長期發展問題「短期化」，變得更加突出，同時也會使中國社會的長期城鄉不公平矛盾「尖銳化」；為了應對WTO的挑戰，中國政府最大的發展目標是使八億農民廣為受益，最大的公共投資受益者應是八億農民。

註釋

① 王紹光：〈開放性、分配性衝突和社會保障：中國加入WTO的社會和政治意義〉，《管理世界》，2002年第1期。

② 根據現行戶籍統計，2000年我國鄉村人口數為92,820萬人，見《中國統計摘要》(2001)，頁102；根據國家統計局1999年發布的《關於統計上劃分城鄉的規定(試行)》，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統計，2000年我國鄉村人口數為80,739萬人，見《中國統計摘要》(2001)，頁37。本文採用後者統計口徑。

③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2001*, 164.

④ Angus Maddison, "Chinese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the Long Run", *OECD*, 1998.

⑤⑦⑩⑫⑬⑭⑮ 《中國統計摘要》(2001)，頁18；107；104、107、145、151；84；97；99；91。

⑥ 《中國統計年鑒》(2001)，頁61-62。

⑧⑪ 《中國統計年鑒》(2002)，頁874-76；303。

⑨ WHO, 2001.

⑬ 黃延倍、陳良彪(農業部產業政策與法規司)：〈今年農民增收形勢分析及政策建議〉，2001年6月1日。

⑰ 根據國家統計局統計，1999年全國農村人口為87,017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69.11%。參註⑤，頁37。

⑱ 最新全國人口普查數據2000年全國農村人口為80,739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63.78%。參註⑤，頁37。